



告别『中国奇迹』

黄益平◆著

farewell
china miracle



影响力书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告别『中国奇迹』

黄益平◆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中国奇迹”/黄益平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5097-2923-6

I. ①告… II. ①黄…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3219 号

告别“中国奇迹”

著 者 / 黄益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26 责任编辑 / 恽 薇 许秀江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校对 / 张延书

项目统筹 / 恽 薇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5.25

版 次 /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字 数 / 249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923-6

定 价 / 3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陈 健 刘 军 曹 益 著 陈 磊

目 录

陈 健 刘 军 曹 益 著 陈 磊

从奇迹走向常规：中国经济的下一个转型（引言）

告别“中国奇迹”：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24
告别“中国奇迹”，保障可持续增长	25
环境承载力：“中国奇迹”的极限	30
“中国奇迹”正在走向终结	34
从“天上的奇迹”回到脚踏实地的“常规”	38
市场化改革已到“临门一脚”的时刻	41

告别“中国奇迹”：政府面临的困惑

经济结构调整靠什么？	45
------------------	----

以金融改革促发展方式转变	49
以金融创新促经济增长	54
中国亟待重建诚信	59
以教育改革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64
人大代表应该问责经济决策	69
谎言、糟糕透顶的谎言与统计数据	74

告别“中国奇迹”：宏观政策的艰难选择

宏观经济政策的“三难选择”	79
吹泡沫的宽松货币政策像吸鸦片	84
通胀风险不容低估	89
如何扼住通胀咽喉？	94
央行应当干预资产市场	99
货币政策改革勿迟疑	102
呼唤积极的财政政策	106

告别“中国奇迹”：资产市场与投资的逻辑

民间投资决定长期增长	110
股市的逻辑	114
限购、预期与房价	118
虚幻的白银财富	123
灾难之后的投资决策	128
中国的投资环境改变了么？	133
似曾相识的金融扩张	138
中国投资的海外陷阱	141

对外投资的“中国模式”	146
-------------------	-----

告别“中国奇迹”：人民币的前途与命运

国际经济政策不可能三全其美	149
克鲁格曼的人民币谬论	154
应对国际压力的政策艺术	158
破解汇率政策僵局	163
把脉“升值恐惧症”	168
汲取历史教训	173
汇率自由浮动又如何？	178
人民币国际化政策的误区	183
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	188

告别“中国奇迹”：中国是否需要重新定位

中美能否避免经济冲突？	194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与中国的通胀风险	199
虚张声势的美元政策	206
前所未有的欧元危机	209
遏制全球通胀的长期力量	214
亚洲会与中国经济脱钩吗？	217
亚太的新政治经济学	220
“亚洲共识”的三大问题	224
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国想要什么？	228
后记	236

从奇迹走向常规： 中国经济的下一个转型（引言）

中国从 1978 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短短的 30 多年间，中国由一个封闭的、以农业为主的低收入国家变成了影响力遍及全球的经济大国。尽管按照人均收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但它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绝大多数的经济大国，特别是在全球通货膨胀、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以及全球外汇市场等方面的影响举足轻重。连续 3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堪称世界少有的“经济奇迹”。

作为大国经济，不但中国的政策将直接影响世界经济与市场，国际社会也会对中国提出更多的要求。从汇率政策到资本管制，从全球失衡到气候变化，从贸易谈判到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国无不处于国际经济政策争论的中心。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现象，比如，中国一方面还是中低收入国家，另一方面已经是拥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强国。同时，在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上，基于高速增长的乐观主义与基于结构失衡的悲观主义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脱节。我们将这一系列看似矛盾的现象称为“中国经济之谜”。

自 2009 年 6 月正式加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笔者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试图解开这个“中国经济之谜”。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关于当前中国经济的两大命题：一是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的过渡；二是从小国

经济向大国经济的转变。如果这两个预期真正实现的话，未来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放慢，通胀的压力将会上升，产业升级的步伐将会加速，经济失衡的矛盾将会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将会改善，经济周期将会变得日益突出。而中国也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同时拥有相应的权利与责任的经济强国。

这些变化有的已经发生、有些即将发生，中国已经是个大国经济，但尚未进入常规发展阶段。这些已经或者即将发生的变化无一例外地将对每个人和每个企业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甚至可能决定中国与世界经济未来。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可能是平稳的，也可能是带有破坏性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重新改革许多已经习以为常的政策，尽可能地实现平稳过渡。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作用已经逐渐超过经济影响，比如过去政府通过压低利率支持投资建设或者通过压低币值支持出口企业，已经导致资本效率低下和经济结构失衡，甚至有可能使我国成为国际经济矛盾的焦点。

什么是奇迹？奇迹是在通常条件下不太可能发生的现象，也可以说奇迹就是非正常现象。我国经济在过去 30 年创造了“中国奇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而促成这个奇迹的，也确实有一些合理的因素。我国在改革以前常年实施中央计划体制，资源配置效率极度低下，在改革开放的前夜国民经济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旦开始经济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原来经济中被常年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了，比如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就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过去 30 年经济高速增长看做是一种报复性的反弹。

我国的政策选择也对创造“中国奇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 30 年最突出的政策就是“非对称市场化改革”，即产品市场已经被彻底地放开，但要素市场却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政策扭曲。我们通常把要素市场扭曲看成改革不彻底的表现，但其实在很多时候，它们也是决策者有意选择的结果。比如政府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税收、土地、信贷等优惠，其实是一种扭曲，但极大地鼓励了外国资本的流入。另外，过去 30 年我国的金融改革一直保持缓步推进的做法，保留了相当多的金融抑制措施，如利率控制和贷款干预等。这些做法通常被认为有损效率和增长，但在市场制度尚不完善、监管能力有待提高以及信息还不充分的前提下，其实是有利于经济

增长的。

事实上过去 30 年我国要素市场的扭曲是相当广泛的，几乎涉及劳动力、土地、资本、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等所有要素市场。这些扭曲的结果，是要素价格被低估，生产成本被压低，相当于变相地为生产者、出口商和投资者提供补贴。这些隐性的补贴人为地提高了生产利润、增加了投资回报，并增强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样，经济增长速度被进一步加快了，但投资和出口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被人为地提高了。超过正常比重的外部经济放大了中国在世界市场的影响力，而超过正常比重的投资加速了城市面貌的改变。正是因为结构性的扭曲，给世人造成了中国已经是影响力遍及世界的发达经济的错觉。但它们同时也降低了经济效率并最终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令人焦虑的是，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深化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理论的层面，而应该真正落实到政策实践上。过去一度行之有效的政策已经难以为继，现在必须改变政策策略，告别“中国奇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影响全球

2004 年 9 月，笔者在美国出差。9 月的第一个周一是美国的劳动节，联邦假日。公司为了充分利用笔者的时间而临时把笔者派到巴哈马首都拿骚出差。巴哈马群岛位于佛罗里达海峡口外的北大西洋上，再往南便是古巴。巴哈马共有 30 多万人口，700 多个海岛，拥有 10 万平方英里号称世界上最清澈的海域，还有世界上最浪漫的粉红色沙滩。风景秀美，生活悠闲，仿佛世外桃源，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公司租了一辆车方便笔者在拿骚活动，司机是当地人，工作十分尽职，但不是很健谈。不过后来他知道笔者是从中国来的经济学者，突然问笔者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哪一天开会？说实话，他的问题令笔者十分惊讶。

2004 年年初，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症状。到了 7~8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超过了 5%，食品价格指数更是快速逼近 15%。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经济过热，包括强制关闭非法上马的投资项目和控制商业银

行的新增贷款等。当时市场上对利率政策的动向颇多猜测。

笔者在美国出差那几天也正是市场对加息的可能性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不过巴哈马与中国隔了整整半个地球，北京与那骚之间的距离超过 1.3 万公里，当地的经济似乎与中国也没什么直接联系。忽然被问到关于中国的利率政策问题，一时之间笔者确实有点反应不过来。事实上，他问这个，并不是为了寻找聊天的话题。其实他是个投资者，当然他并没有购买中国的资产，但他持有一些拉美国家的货币。而那些国家都盛产和出口矿产资源，中国则是这些市场的主要购买者。因此中国的经济状况对于拉美国家的出口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假如中国加息，可能就会降低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并由此令拉美国家的出口减少、经常项目恶化，甚至经济增长减速，其货币就会贬值。这样，中国的货币政策成了拉美国家货币币值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后来在沙滩旁边的小咖啡馆里，笔者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给他解释中国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中国人民银行确实有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们一般每季度开一次会，但据笔者所知，它好像并不预先公布季度会议的日期。与其他国家的体制不同的是，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不是一个决策机构，它实际更像一个参谋机构。甚至连央行本身也只能对货币政策调整提出建议，中国货币政策的决策权在国务院而不在央行。海外的投资者往往不了解这一点，以为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与美联储或者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委员会一样，会在例会期间决定货币政策的调整。但其实并非如此。

这位巴哈马司机也许是个特殊个案，但他的故事揭示了一个已经众所周知的事实：经济全球化已经将许多本来毫不相干的人和事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而在这个已经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中国已经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因素。在中国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世界各个角落的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包括巴哈马的司机、南非的矿工、澳洲的农场主、瑞士的钟表师和美国的消费者。

2005 年 1 月 1 日，美国芝加哥的女记者 Sara Bongiorni 一家决定在一年内不购买任何中国生产的产品。从理论上来说，这当然是容易做到的，超级市场的货物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也很多。不过 Bongiorni 一家却度过了极其不平凡的一年。从生日蛋糕上点的蜡烛到体育运动穿的鞋子，要找到不是中国生产的产品，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旅行箱坏了，需要找非中

国生产的零配件，那就更不容易了。即使他们最终能够成功找到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通常其价格起码要比中国产品高出 20% ~ 50%。最要命的是，即使买了美国、日本或者欧洲生产的产品，你也无法确定这些产品里一定没有产自中国的元件。Bongiorni 后来把她家一年的生活经历写成了一本非常有影响的书——《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

Bongiorni 一家的经历再次佐证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这一客观事实。2007 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生产的比重已经达到 12%，到 2010 年，中国已经赶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已经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 30 年间，从生产廉价的服装、鞋子、玩具和旅行产品开始，逐步转入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等行业，最近几年又涉足高端电子产品甚至汽车等。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中国占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例已经接近 20%。因为这些产品都是生活消费品，不管是生活在亚洲、欧洲还是美洲，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不过，生活消费品还仅仅只是一个局部，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已经扩散到许多领域。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保持 10% 的增长速度，其庞大的投资规模以更快的速度扩张，中国迅速地成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主宰力量之一。2009 年，中国在许多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比例已经高得惊人：铁矿石，53%；铝，36%；锌，30%；铜，23%；镍，20%。中国在世界原油市场的比例相对较低，只有 8%，不过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中国占到全球新增原油需求的 50% 左右，这就对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许多石油专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需求的增长，使得国际市场的油价从 2002 年的每桶 20 美元飙升到 2008 年年中的 150 美元。也正是中国支持的所谓的大宗商品市场的“超级周期”，使澳大利亚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国享受了连续十几年的经济繁荣。

中国的全球影响还反映在国际外汇市场上。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亚洲国家的部分官员指责中国政府在 1994 年将官方汇率和调剂汇率并轨，导致实际汇率贬值，严重影响了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使它们的经常项目日渐恶化，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暂且不论这样的观点是否有道理，它起码说明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亚洲国家已经将中国认定为出口市场的重要竞争者。1997 年年底，中国政府为了避免在亚洲出现“竞争性贬

值”，顶住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固定在 8.27。这一举动令中国在全世界赢得了负责任的大国的赞誉。东亚危机结束以后，多数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开始密切跟踪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并将其作为汇率政策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部分亚洲国家如泰国和新加坡已经开始将人民币作为构成其官方外汇储备的一种重要货币。原先东亚是典型的“美元区域”，新的变化使得有些专家开始将这一地区看做潜在的“人民币区域”。

这一发展从表面看是挺奇怪的，因为迄今为止，人民币还没有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不过人民币汇率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体现在他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上。亚洲国家要么与中国的出口产品有直接的竞争关系，要么为中国的生产提供元配件，分别是同一条供应链上的上、下游环节。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他们的出口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对外汇市场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其庞大的外汇储备上。2009 年年初，全球的外汇储备大概为 7.2 万亿，但中国的储备已经超过了 2 万亿，而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已经超过 4 万亿。因此，在最近几年，每当中国的官员或专家讨论外汇储备投资多样化的问题，即减少美元资产持有的比例，美元便会受到明显的贬值压力。

还有一些美国的官员、政客和学者认为中国的高储蓄和经常项目顺差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因素之一，前美国财长鲍尔森（Henry Paulson）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就曾经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中国每年向美国输出大量的廉价资本，压低了美国的利率，降低了美国居民的储蓄意愿同时增加了他们的消费需求，这使得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资产泡沫日益严重，最终爆发了金融危机。对于这些指责，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已经在关于国际货币体系和储蓄率的一系列文章中间接地作出了反驳。不过关于中国的廉价产品出口压低全球通货膨胀率的说法由来已久，而且每次中国国内价格上升，都会引起全球新一轮通胀的担忧。

这样看来，中国似乎已经对世界经济具备了全方位的影响力。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最近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中国的地位却变得越发重要起来。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等学者甚至认为世界已经开始进入由美国和中国共治的时代，呼吁成立两国集团（G2），由美中两国来决策未来世界的重要事务。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

（Robert B. Zoellick）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呼吁美中两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世界经济的一些挑战。值得指出的是，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专家。在资产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者认为今后要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首先要对两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与政策有准确的理解与把握，那就是美国和中国。

不管其现实可操作性如何，现在有不少人开始肯定“美、中共治世界”建议的合理性。当然部分欧洲人也许是例外，他们一时之间也许还难以接受他们即将失去与美国一起共同决定世界事务的资格或者将有新的伙伴参加到他们的决策团体里来的严酷事实。可是世界经济格局确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近 10 年间有两大重要事件值得关注：一是中国加入了 WTO，经济进一步开放，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一员；二是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经济衰退，其全球经济的领袖地位开始动摇。这两个事件加在一起，实际是加速了美国经济的衰落和中国经济的崛起，为 G2 的构想创造了客观的经济基础。

美国次贷危机和中国加入 WTO 也许是两个偶然事件，但如果考察世界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主导世界的经济总是在不断地更替，“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听起来挺残酷的，其实是历史的必然。自 15 世纪以来，主导世界经济的国家一般是各领风骚 100 年：从葡萄牙（公元 1450 ~ 1520 年）、西班牙（1530 ~ 1640 年）、荷兰（1640 ~ 1720 年）、法国（1720 ~ 1815 年）到英国（1815 ~ 1920 年），几乎没有出现过例外。美国主导世界经济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如果遵循过去几百年的规律，在不远的将来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可能就会发生动摇。当然谁将成为新的霸主，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30 年超常规崛起的“中国奇迹”

60 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从 1820 年的 32.9% 下降到 4.5%。在随后的 30 年间，共和国的开创者们绞尽脑汁，采取了各种措施，试图赶超英美发达国家。他们取消自由市场，实行中央计划，集中所有的资源搞经济建设，而重点则是发展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可惜这一战略最终没有成功，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占世

界经济的比重还只有 4.6%。但经过近 30 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宏观和微观层次的效益和效率受到了严重破坏，经济体系已经难以持续。后来放弃计划经济制度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其实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真正启动了中国经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进程。在随后的 30 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10%，改革期间中国的 GDP 已经翻了约 10 倍。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实是意料之中的事情，2003 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回到 13.1%。应该说，即使是对长年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来说，中国经济崛起的速度也是令人震惊的，在历史上似无先例，是真正的“超常规”崛起。

中国经济崛起的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学家的预期，部分原因可能是多数专家往往用线性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及其国际影响力，没有考虑中国影响力的乘数增长效应。一向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郜若素（Ross Garnaut）教授曾经多次指出，一个后进国家在赶超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加速的现象，他在考察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如新加坡和韩国等的起飞过程中发现，当一国的经济实现高速发展，它的货币也会升值。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以国际货币衡量的经济规模的增长速度就会快于官方的 GDP 数据。因此即使经济学家们准确地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仍然会低估经济赶超的步伐。郜若素断言中国经济崛起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

不过，即使考虑了这个“郜若素因素”，我们还是对今天中国经济已经拥有全方位的国际影响力而感到震惊。尽管中国已经在最近赶上日本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它仍然还只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根据 IMF 以市场汇率计算的 2010 年的人均收入数据，在 180 个经济中，中国被排在了第 95 位。也就是说，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其实还是个穷国。绝对算不上经济强国。即使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估计的数据，中国在 2008 年的人均收入也只有 5960 国际元（International Dollar），不仅美国的人均 46000 国际元遥不可及，与马来西亚的 14000 国际元和韩国的 27000 国际元的差距也非常大。中国在 IMF 数据所包括的 180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100 位，而在世界银行数据所包括的 166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89 位。因此，中国是个经济大国，那仅仅是因为中国有 13 亿人口，任何收入乘以 13 亿都是个庞大的数据。

国际上感受到中国的经济影响不仅仅是虚无缥缈的幻觉，而是实实在在的力量，中国的经济确实在影响着世界各个角落的人民的生活、生产甚至货币。而且，对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强烈感受不仅来自国际上，同样也存在于国内。

2009年10月的一天，笔者应邀为一帮美国的学生介绍中国经济形势。这些学生在美国一所著名的商学院学习工商管理，来自十多个不同的国家，绝大部分是第一次来中国。在开讲以前，笔者问大家在北京、上海参观访问多天，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有的学生说中国人直言不讳地讨论现实问题的态度出乎他们的预料。在国外，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从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中得到的，普遍的印象是：受到孔孟之道的影响和政治体制的约束，大多数中国人说话和做事都是拐弯抹角的，甚至唯唯诺诺。但到中国后，与老百姓、学者和政府官员接触之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大多数中国人在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中，非常坦诚，毫不避讳对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对其他国家问题的看法，当然也不掩饰他们对自己国家经济实力上升的自豪感。有的学生甚至说这些行为与他们在日本和韩国所看到的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但更多的学生觉得他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原先的预期。在来中国之前，他们对中国经济已经有所了解，当然知道中国经济经过30年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大国之一。不过当这些学生真正穿梭在中国各地城市的大街小巷的时候，还是对这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感到震惊。北京长安街和上海浦东密密麻麻的现代化高楼和风景如画的绿化园林，无法让他们置信他们身处人均收入只有3000多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造访的中国大型机构总部的现代化程度远远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通常小小的缺憾是电梯有的时候不工作，洗手间也不是全部都很干净。但大部分学生以前去过许多亚洲、欧洲和美洲的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比中国要高许多，它们看上去好像还远没有中国发达。学生们的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收入水平高许多的经济，比如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韩国。

其实经常在各国旅行的人都有这样的观感，即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似乎比一些发达国家还要好。几年前，笔者曾经在一次闲聊中向来自美国的老板抱怨，现在由亚洲去英美等国家出差，感觉像是从发达国家到了发展

中国。当然旅行者直接接触的主要是酒店、街道、地铁、机场等设施。不客气地说，与中国相比，一些发达国家的服务水平已经明显落后，这不仅体现在软件方面，更主要的是反映在硬件方面。去欧洲出差，最怕的是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转机，那里不但设施已经十分破旧，而且设置也非常不合理，从一个登机口步行到另一个登机口，往往需要长途跋涉。这与中国的许多崭新、干净和高效的机场形成鲜明的对比。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第三航站楼和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同样，纽约街道的陈旧和地铁的脏乱，似乎也与其世界最繁华大都市的名气不符。

导致这种收入水平与实际感受之间的落差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可能是官方数据确实存在低估实际收入水平的现象。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统计系统不够完善，往往不能完整地把所有经济活动都统计进去。服务业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服务业非常不发达，政府基本上不鼓励服务业发展。因此大部分服务业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但统计部门缺乏准确统计或估计服务活动的的能力，一些从业人员为了避税也不愿意申报他们的收入。家庭服务的情况就更特殊了，过去服务业的社会化程度不高，什么事情都是在家庭内部解决，比如说自己纺织、织布、制衣，算不算经济活动？当然算，但要准确地统计这些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中国从计划经济年代过来，对于很多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也很难以市场价格来度量。20世纪90年代初期，郅若素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曾经试图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模式来反推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他们的结论是，即使不考虑购买力扭曲的因素，中国的实际收入水平应该是官方数据的2.5倍。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统计体系的改善已经逐步缩小，这个低估的倍数已经在过去十几年大幅度地缩小了。

购买力扭曲是引起收入水平低估的另一个原因。购买力平价的基本依据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收入水平比较不能简单地依靠市场汇率，而应该看他们各自的购买能力。比如说，一个中国的鸡蛋和一个美国的鸡蛋是一样的，那么在中国购买一个鸡蛋的钱和在美国购买一个鸡蛋的钱应该是等值的。以此类推到所有产品，我们就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

根据IMF和世界银行最新的PPP数据，中国的购买力平价收入水平应该是官方数据的两倍左右。不过这一方法的缺陷也很明显，实际上要将每个经济中的所有产品作出具体的估价，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更重要

的批评是，你可以说中国的一个鸡蛋与美国的一个鸡蛋是完全相同的，但你能说中国的一套 100 平方米的住房与美国相同面积的一套住房也是完全相同的吗？哈佛大学的库伯（Richard N. Cooper）教授就一贯反对用 PPP 数据衡量中国的经济收入，他认为，第一，这套数据的准确性很差，因此可信度也不高；第二，PPP 数据常常为美国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依据。

但即使考虑了所有的数据问题，也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下面两个方面之间的巨大差距：无论以何种数据来衡量，中国也还是一个处于中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内经济发达程度，似乎已经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必定还存在另外更为重要的因素导致了这一明显的脱节现象。

乐观预期与悲观前景并存

中国经济改革 30 年的巨大成就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却一直是个极富争议性的话题，30 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乐观的看法是，中国的高速增长还能保持几十年。因此，中国很快便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1 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而悲观的看法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是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失衡和矛盾加剧为代价的，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到难以复加的地步，因此中国经济不仅不能维持高速增长，而且有可能很快就会崩溃。这种截然相反的预期，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中国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成功也有风险，乐观派和悲观派无非是将他们关注的重点放到了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已。在不同的阶段，乐观派和悲观派之间的比例会有所波动，近年来总的趋势是乐观派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不过悲观派的声音从来也没有消失过，尽管最近他们的听众市场确实有萎缩的趋势。

2006 年 12 月 1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邀请两位美国顶级的中国经济专家在华盛顿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改革政策与经济前景的辩论。组织者给出的命题是：“如果不能明显地加速改革并采取新的改革措施，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在赶上美国经济以前解体”。组织者分别邀请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胡永泰（Wing Thye Woo）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